

逻各斯中心主义视域下莎士比亚悲剧二元对立与人性探索

柯贤飞

(莫吉廖夫国立大学, 莫吉廖夫, 白俄罗斯)

摘要: 威廉·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深刻揭示了人性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其艺术深植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传统, 核心特征表现为一系列深刻的二元对立结构。本文以《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四大悲剧为研究对象, 系统分析剧中人物在欲望与理性、理想与现实、善与恶、强与弱等对立范畴中的挣扎与失衡。研究指出, 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歌, 更是文艺复兴晚期人文主义思想从“神本”向“人本”转型过程中, 对“人”的再发现与再反思的艺术呈现。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哲学视角的结合, 旨在阐释莎士比亚如何通过二元对立的戏剧张力, 展现人性的光辉与局限, 并探讨其对当代人性理解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莎士比亚悲剧; 二元对立; 逻各斯中心主义; 人性探索; 人文主义

引言

在欧洲文艺复兴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 威廉·莎士比亚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文学巨星。他的戏剧, 尤其是被誉为巅峰之作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与《麦克白》, 之所以能跨越四百余年仍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关键在于其对人性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刻洞察与艺术呈现。这些作品不仅是精彩的故事, 更是对人类灵魂的深度解剖。它们不仅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发现、对个体价值与自由意志的颂扬, 更蕴含对人的尊严、价值、本质及其局限性的不懈探索与深切关怀。本文旨在以这四部悲剧为核心文本, 聚焦于“欲望与理性的失衡”这一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 解读莎士比亚如何通过其笔下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精妙的戏剧结构, 展现人性内部的激烈冲突、复杂构成及其悲剧性后果。他所塑造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人物, 既是特定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的产物, 也因其揭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欲望与困境, 从而超越了时空, 成为映照人性自身的永恒象征。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经典断语所揭示的, 莎士比亚悲剧的开放性正源于其对人性复杂性的真实刻画。本文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理论框架, 分析莎士比亚如何通过对立范畴的冲突展现人性的复杂面相, 并揭示其悲剧艺术的现代性价值。

1 文艺复兴背景下“人”的内涵演变与莎士比亚的超越

文艺复兴运动的根本精神在于“人”的重新发现与解放。它标志着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神本”世界向“人本”世界的转向。早期人文主义者如拉伯雷, 在其《巨人传》中以磅礴的气势颂扬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 将其视为对抗中世纪神学禁欲主义、彰显人之伟大的旗帜,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洞察, 充满了语言的诗意和结构的创新, 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深度^[1]。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作品也无不洋溢着对现世生活、个人情感与欲望的肯定。然而,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从中期向晚期推进, 人文主义思想本身也在不断深化, 人们对其的反思亦在加强。人们逐渐认识到, 人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欲望的毫无拘束地释放, 更在于人所独有的理性思维能力、创造才能以及在理性引导下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

莎士比亚正是处于这一思想转折点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创作生涯见证了人文主义从乐观昂扬到深刻内省的演变。莎士比亚在四大悲剧中正是通过弘扬人文主义来热烈地讴歌人性, 透过悲剧主人公坚毅不屈的抗争人格展现悲剧美学, 进一步丰富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内核^[2]。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世界里, 理想的人文主义者形象, 并非为满足个人欲望而不择手段的“巨人”, 而是能够在“欲望”的驱动与“理性”的规训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的“完整的人”。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 欲望挣脱了理性的缰绳, 或理性过度压抑了生命的活力, 便会导人性的扭曲与分裂, 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莎士比亚的伟大超越, 正在于他不仅描绘了文艺复兴早期对“人”的礼赞, 更深刻地揭示了“人”自身所包含的悲剧性矛盾, 从而将其对人性的探索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

作者简介: 柯贤飞 (1999—), 男, 四川成都人, 教师, 毕业于莫吉廖夫国立大学, 硕士, 主要从事社会教育学、现当代文学研究, 邮箱: keke3957@outlook.com

2 四大悲剧中人性失衡的典型表征

莎士比亚通过其笔下一个个鲜活而复杂的人物形象，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人性在多种“二元对立”力量拉扯下的失衡状态，以及这种失衡如何一步步地将人物推向命运的深渊。

2.1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哈姆雷特的延宕悲剧

哈姆雷特的悲剧，其核心在于一个怀抱人文主义理想的青年王子与他所面对的黑暗、污浊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这一鸿沟所导致的思想与行动的严重脱节，即著名的“延宕”。剧本伊始的哈姆雷特，是一个在威登堡大学接受新式教育的“快乐的王子”，他相信人的高贵与理性。然而，父王的暴死、母亲乔特鲁德对弑君篡位的叔父克劳狄斯的迅速改嫁，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彻底粉碎了他对人性、对世界的美好想象。他感叹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句独白道出了他巨大的压力与无奈。

他的复仇行动之所以一再迟疑，并非简单的怯懦。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所要复仇的对象，不仅是杀父仇人，更是当下代表着整个腐败秩序的君王。复仇行动本身，意味着他将不得不采用与他所憎恶的阴谋、暴力相似的手段，这与他内心信奉的人文主义理想（理性、正义、秩序）相悖离。因此，他的“To be, or not to be”的著名独白，是对生命意义、行动价值的终极哲学思考，是行动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后果（尤其是死后世界的未知）所带来的恐惧。正如柯勒律治所言，哈姆雷特的性格是“行动的能量被思想的深度所淹没”。他精心安排“戏中戏”以证实克劳狄斯的罪行，正说明他追求的不是简单的血亲复仇，而是要在理性与证据的基础上执行正义。然而，在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这种对理想化正义的执着，反而使他错失良机，虽然最终手刃仇敌，却也导致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死亡。这份冲击迫使他开始直面人性的复杂、道德的模糊与生命的终极意义，内心陷入了激烈的冲突与无尽的困惑^[3]。

2.2 雄心与野心的蜕变：麦克白的人性沦丧

麦克白的悲剧则是一部“雄心”如何在不加节制地滑向“野心”，导致人性逐步沦丧直至彻底毁灭的惊心动魄的记录。剧本开始时，麦克白是苏格兰王国功勋卓著的将领，被称为“英勇的麦克白”，其勇敢与忠诚备受赞誉。然而，女巫的预言（“祝贺你，未来的君王！”）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他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这种渴望起初还受到其道德感和荣誉感的抑制，他内心充满矛盾：“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件事吧。他最近给了我极大的尊荣，我也历经努力从众人之口赢得了无上的美誉。”

但是，在麦克白夫人“你渴望伟大，却又希望不用罪恶的手段”的强烈怂恿下，他的野心最终压倒了一切。弑杀邓肯是他跨越道德界限的决定性一步，从此他便在罪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为了巩固王位，他接连杀害班柯、麦克德夫的家眷，从一位英雄蜕变为暴君。莎士比亚精彩地刻画了麦克白在犯罪后的心理煎熬：幻觉、失眠、无尽的恐惧。他感叹道：“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退下。”这表明，在获取了野心所追求的一切后，他感受到的并非满足，而是彻底的空虚与虚无^[4]。麦克白的悲剧不仅在于他最终的败亡，更在于他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人性的彻底迷失。他的毁灭，是野心吞噬人性后必然的结局，也是自我选择的结局^[5]。

2.3 纯净心灵与轻信多疑的悖论：奥赛罗的嫉妒之火

奥赛罗的悲剧极具震撼力，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看似完美的英雄，其性格中最宝贵的品质——坦率、真诚、富于激情，在特定条件下如何反而成为导致其毁灭的致命弱点。奥赛罗作为摩尔人将军，凭借其卓越的战功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威尼斯元老院的尊重和苔丝狄蒙娜的爱情。他爱得深沉而纯粹，正如他所说：“她爱我是因为我经历的危險，我爱她是因为她同情我的经历。”

然而，正是这种基于纯粹信任的性格，使他完全缺乏对复杂人性之“恶”的防备。阴险的伊阿古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单纯，精心编织了一个关于苔丝狄蒙娜与凯西奥有私情的谎言网络。奥赛罗的轻信，使他从未想过要亲自向妻子求证，或冷静地核实证据的真伪。他的情感世界从一个极端（绝对的爱与信任）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疯狂的嫉妒与恨）。伊阿古的挑拨如同毒药，点燃了他心中非理性的嫉妒之火，这火焰烧毁了他的理智，使他将纯洁的苔丝狄蒙

娜视为必须铲除的“罪恶”。在扼死爱妻的那一刻，他自以为是在执行正义，实则成了罪恶的帮凶。真相大白后，他的醒悟带来的只有无尽的悔恨与自我毁灭。精神分析认为，奥赛罗无意识地以“文饰”的言辞为他的愤怒与杀妻行为进行辩护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御机制^[6]。

2.4 坚强意志与刚愎自用的悲剧：李尔王的人性迷失与回归

《李尔王》的悲剧既展现了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其性格中的“坚强意志”因权力的腐蚀演变为“刚愎自用”，从而导致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王国的灾难；也展现了他在苦难中人性逐渐复苏的悲壮过程。年迈的李尔王在开场时是专横而昏聩的，他习惯于听信谄媚之言，将真诚视为忤逆。他要求女儿们用语言竞赛来表达爱意，并将国土分给巧言令色的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而将真心爱他但言辞朴拙的小女儿考狄利娅驱逐。

这一愚蠢的决定，使他从权力的顶峰跌落，饱受忘恩负义的女儿们的驱逐与虐待。在暴风雨肆虐的荒原上，他被剥夺了所有王室服饰，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开始同情“可怜的衣不蔽体的人们”。这场暴风雨既是对外部世界的写照，也是他内心风暴的象征。在疯狂与痛苦的边缘，他的人性开始觉醒，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我是个年老糊涂的人。”相比于女儿们的冷酷与狠毒，这猖狂的风暴侵袭李尔王的肌肤可谓是小患，他终于在亲情背叛的伤痛中觉醒：“善良被遗弃，正直被流亡”，平静的“幸福生活”被消逝^[7]。然而，莎士比亚没有给予一个廉价的团圆结局，考狄利娅的被害最终将李尔王的悲愤推向了极致，他也随之心碎而亡。李尔王的悲剧说明，脱离理性判断与人文关怀的坚强意志，会异化为毁灭性的刚愎自用。而人性的真正回归，往往需要经历巨大的苦难和彻底的失去才能获得，但这觉醒却常常来得太迟，从而更具悲剧色彩。

3 生存论视角：失衡的根源与平衡的寻求

莎士比亚的悲剧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善恶报应模式，直指人性悲剧的内在根源——“失衡”。这种失衡，其哲学基础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及其所衍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如善与恶、理性与欲望、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等）。莎士比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站在某一极（如理性）去否定另一极（如欲望），而是将人物置于这些对立力量的激烈冲突中，真实地展现人性在其中的挣扎与撕裂。

他所探寻的，并非对某一极的彻底胜利，而是一种动态的、艰难的“平衡点”。这种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以“适度与平衡”为核心的“中庸之道”高度契合。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美德是一种“中道”，存在于“过度”与“不及”之间^[8]。例如，勇敢是怯懦与鲁莽的中道。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恰恰是失去了这种“中道”：哈姆雷特的思考过度而行动不及，麦克白的雄心不足而野心过度，奥赛罗的信任过度而审慎不足，李尔王的威严过度而谦逊不足。

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反思，正是意识到了早期人文主义者无限度解放欲望可能带来的危险。莎士比亚通过其悲剧人物向世人昭示：人的自然欲望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其满足必须在理性的审视与引导下进行，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伦理规范^[9]。换言之，人性的健康与完整，有赖于欲望与理性、情感与理智、个体意志与社会责任之间达成一种和谐的平衡。这种对“平衡”与“度”的强调，是莎士比亚悲剧留给后世的核心智慧。在当今这个技术理性高度发达、物质欲望空前膨胀的时代，重新审视莎士比亚的悲剧，呼唤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为旨归的“人文理性”，此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在追求个性解放与物质满足的同时，必须警惕内在的失衡，时刻以理性之光烛照内心，寻求生命的和谐与精神的健全。

4 人性探索的现当代启示

莎士比亚悲剧的伟大，在于其揭示的人性课题具有永恒的普遍性。他笔下人物的挣扎与困境——哈姆雷特关于生存意义的拷问、奥赛罗因嫉妒而生的信任危机、麦克白对权力的无限贪婪、李尔王对爱与价值的误判——并非仅仅属于文艺复兴那个特定的时代，而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都可能面临的共通情感与道德困境^[10]。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与信息的爆炸并未消解这些人性的基本命题，反而在更复杂的语境下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当代大量优秀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如那些对人性异化、精神孤独、

道德模糊地带进行深刻描绘的作品, 均可视为莎士比亚开创的人文关怀与人性探索传统的延续与回响。

莎士比亚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他毫不回避人性的缺陷与社会的黑暗, 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揭露; 但另一方面, 即使在最黑暗的悲剧中, 我们也依然能看到人性中善的光芒与回归的努力: 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的忏悔与对底层民众的同情, 奥赛罗最终的自刎谢罪, 甚至麦克白在绝望中残存的英雄气概, 都闪耀着道德觉醒与人性尊严的最后光辉^[1]。这种在绝望中仍不放弃对善与秩序的追求, 在揭露丑恶时仍怀有深切悲悯的精神, 是莎士比亚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他告诫我们, 人性的完善是一个永恒的历程, 在大力倡导个性解放与创造力的同时, 必须时刻警惕欲望的泛滥与理性的缺席, 不断寻求内在的平衡与和谐, 这才是通往真正自由与幸福的途径。

5 结论

综上所述, 莎士比亚的悲剧艺术是其深邃人性观的集中体现与艺术升华。他通过“四大悲剧”这面无比清晰的镜子, 巨细无遗地映照出人性的复杂光谱: 崇高与卑劣、理性与欲望、坚强与脆弱、真诚与虚伪。这些看似对立的面相, 正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每一个个体之中。其悲剧人物的命运雄辩地证明, 人性的内在失衡是导致个体悲剧乃至社会动荡的深刻根源, 而对动态平衡与精神和谐的寻求, 则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莎士比亚并非悲观的宿命论者, 他对人性缺陷的深刻揭露, 恰恰源于他对人性能够趋向完善所抱有的殷切希望与坚定信念。在四百余年后的今天, 重读莎士比亚, 不仅是对文学经典的一次朝圣, 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审视与灵魂对话。他所倡导的在理性框架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扬善抑恶、追求人性之善与精神平衡的思想, 对于我们在纷繁复杂、充满诱惑的现代社会中安顿身心、实现人性的回归与升华, 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价值与永恒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 李龙. 浅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性哲学[J]. 哲学进展, 2025, 14(1): 179-18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29>
- [2] 付中上.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J]. 名作欣赏, 2023(11):136-138.
- [3] 张文瑞.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女性人物的悲剧成因探析[J]. 戏剧之家, 2025(21):19-21. DOI:10.26959/j.cnki.CN42-1410/J.2025.21.004.
- [4] 赵欣月.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看莎士比亚悲剧中女性角色的刻画——以《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为例[J]. 长江小说鉴赏, 2025(19):121-124.
- [5] 吴月. 《麦克白》中的认知隐喻解读[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4. DOI:10.27064/d.cnki.ghasu.2024.000198.
- [6] 李慧子. 心理分析与悲剧观念[D].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11.
- [7] 周锐. 论《李尔王》疾病叙事的意向维度[J]. 景德镇学院学报, 2022, 37(01):25-29.
- [8] 牟梓豪. 莎士比亚戏剧悲剧人物塑造研究[J]. 国际公关, 2022(15):52-54. DOI:10.16645/j.cnki.cn11-5281/c.2022.15.047.
- [9] 霍胜杰. “逻各斯中心主义”下的自我建构[J]. 中国西部科技, 2015, 14(04):69-71.
- [10] 李爱云. 逻各斯中心主义双重解构下的生态自我[J]. 外国文学, 2009(04):63-67+127. DOI:10.16430/j.cnki.fl.2009.04.012.
- [11] 蒋茜. “存在”的困境与悖论——莎士比亚悲剧的存在主义释读回溯[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34(06):145-151+156. DOI:10.13974/j.cnki.51-1645/z.2024.06.026.

Binary Opposi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Shakespearean Trage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ocentrism

KE Xianfei

(Mogilev State University, Mogilev, Belarus)

Abstract: William Shakespeare's tragedies profoundly reveal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s of human nature. Roo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Western logocentrism, his artistry is characterized by a series of profound binary opposition structur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our major tragedies—*Hamlet*, *Othello*, *King Lear*, and *Macbeth*—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struggles and imbalances of characters within opposing categories such as desire and reason, ideal and reality, good and evil, and strength and weakness. The research argues that Shakespeare's tragedies are not merely lamentations of individual fate but also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ediscovery and reconsideration of "humanity" during the late Renaissance transition from a "divine-centric" to a "human-centric" humanist ideology. By combining close reading with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elucidate how Shakespeare employs the dramatic tension of binary oppositions to illuminate the radiance and limitations of human nature, while exploring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humanity.

Keywords: Shakespearean tragedy; binary opposition; logocentrism;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humanism